

论边疆爱国主义历史文化资源融入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理路与机制

——以西藏及涉藏州县为例

边巴拉姆

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凝成,离不开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各族人民广泛深入的交往交流交融。在此交融汇聚过程中,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爱国主义历史文化资源,这些文化资源亟待从融入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层面加以挖掘诠释与传承创新,为此需要回答挖掘何种历史文化资源、历史文化资源缘何融入,以及如何融入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三个基本问题。以西藏及涉藏州县为例,这一区域的各族人民共同创造了丰厚的爱国历史文化资源,表现在具体的人物、事件等文化遗存中,它们已经具备了《爱国主义教育法》确定的爱国主义法律属性,需要从“两个结合”入手,挖掘其重要特性,发挥爱国历史文化资源在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中夯实历史根基、深化文化认同、丰富价值意义、培育主线思维、提升党建效能等重要作用,从教育传承、宣传引导与法治化保障等方面,进行融入机制的构建与优化。

关键词:西藏及涉藏州县 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 爱国主义历史文化资源 融入逻辑

作者边巴拉姆,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中国社会科学院南亚研究中心研究员。地址:北京市东城区张自忠路3号东院,邮编100007。

一、问题的提出

2014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第二次新疆工作座谈会上首次提出“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四个认同”,并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暨国务院第六次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再次强调;^①在中央第六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上明确为“五个认同”(增加“对中国共产党的认同”),进一步优化了党的治国方针和民族理论政策。^②在“五个认同”中,认同伟大祖国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现实基础,对伟大祖国认同的最高体现就是爱国主义,爱国主义是新时代民族精神的核心,也是增强对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

^① 新华社:《第二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在京召开》,《今日民族》2014年第6期;新华社:《中央民族工作会议暨国务院第六次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在京举行》,《中国统一战线》2014年第10期。

^② 习近平:《依法治藏富民兴藏长期建藏 加快西藏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步伐》,《人民日报》2015年8月26日。

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认同的前提要求。^①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第七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上还指出,“要挖掘、整理、宣传西藏自古以来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事实”。^② 习近平总书记不仅把“五个认同”与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的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在逻辑上相统一,将其概括到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体系框架内;还强调了新时期必须坚持正确的中华民族历史观,增强对中华民族的认同感和自豪感。^③ 中华民族文明的不断演进,创造了五千年持续延绵的历史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2023年6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出席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阐释了中华文明的五个突出特性、揭示了“两个结合”的深刻内涵。^④

习近平总书记系列讲话精神和工作部署,为新时代发掘和利用爱国主义历史文化资源指明了方向。我们需要深刻认识西藏及涉藏州县爱国主义历史文化资源的重要性,深入回答西藏及涉藏州县历史文化资源融入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基本问题,包括需要挖掘整理宣传的爱国主义历史文化资源有哪些? 这些资源在何种意义上具有融入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基因? 需要依托怎样的机制实现融入?

目前,有学者已发表“边疆地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历史文化资源融入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红色文化资源融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以及“爱国主义融入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等相关成果。关于中国传统文化历史资源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关系,学者基于云南南诏历史文化资源的发展和形成提出:“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结果是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大一统’‘天下观’等理论渊源的呼应,也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的重要素材资源。”^⑤关于红色文化融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有学者指出,红色文化不仅“继承与发展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的中国实践,有利于优化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理论”,^⑥还承载了“党领导各族群众革命、建设、中华文化认同,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关键要义和必要元素,其具有的历史命运、民族团结、文化整合、情感认同、政治发展等内涵的传承利用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内容”。^⑦关于爱国主义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有学者指出,“爱国主义教育 and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一刻也不能疏忽,需要持续不断地开展行之有效的活动加以巩固”;^⑧有学者指出,爱国主义教育 with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关系看,“爱国主义教育 with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共担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教育使命、共享着‘大我利益’优先的价值原则以及共含着政治底色与文化底色的双重属性,都致力于为共育时代新人培根铸魂”,但需要注意,“两者在学理基础、认同模式以及教育内

① 郎维伟、陈瑛、张宁:《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与“五个认同”关系研究》,《北方民族大学学报》2018年第3期。

② 《习近平出席中央第七次西藏工作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中国宗教》2020年第8期。

③ 谭厚锋、罗安杰:《新时代聚焦“五个认同”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贵州民族大学学报》2022年第2期。

④ 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求是》2023年第17期。

⑤ 子华明、普丽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的向度与路径:以南诏历史文化为考察对象》,《青海民族大学学报》2023年第2期。

⑥ 刘强勋、刘宇杰等:《红色文化资源融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路径研究》,《广西民族研究》2022年第6期。

⑦ 马伟华、顾旭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基于红色文化资源价值内涵与传承利用的分析视角——以云南双江为例》,《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2022年第4期。

⑧ 王延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建设中华民族共同体》,《民族研究》2018年第1期。

容等方面分异于不同的逻辑理路,是‘形似神殊’的”。^① 本文吸收这些有益研究成果,着眼于三个基本问题的讨论,以期为全国各族人民参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提供爱国历史文化资源萃取融入的理论与实践支撑。

二、融入基础:西藏及涉藏州县丰富的爱国主义历史文化资源

“‘历史’要素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塑造生成,既包括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史在历史渊源、语言文化、生产生活、风俗习惯与情感心理等层面对中华各民族的深层浸润,也包括中华文明史在制度传统、政治禀赋、价值理念与思想意识等维度的持续濡化,正是由于这些内容相互间的交互渗透与交融汇合,才共同塑造出中华民族的独特气质与整体风貌,为整个共同体的维系提供了现实基础和合法性来源”。^② 《爱国主义教育法》第六条爱国主义教育的主要内容用列举式规定明确了“爱国主义”的概念、内涵与种类,从该条第二项的中华民族发展史,第三项的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团结奋斗的历史经验和生动实践,第四项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第六项的祖国的历史文化遗产,第八项的英雄烈士的事迹及体现的民族精神、时代精神等都可以看出,涉及中华民族发展史、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团结奋斗的历史经验和生动实践、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革命文化、祖国的历史文化遗产、英雄烈士的事迹及体现的民族精神与时代精神等内容都属于爱国主义历史文化资源。这些爱国主义历史文化资源,从费孝通先生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和民族走廊学说,以及记忆多层性的角度审视,已经成为包括藏族在内的“中国各民族在互动中实现结构耦合而组成一个荣辱与共的具有诸多共同记忆的立体系统”。^③ “中华民族在文明化探索实践中形成的包容性,不仅对自身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对现代社会转型具有重要价值,而且对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构建也具有重要支撑”。^④ 以西藏及涉藏州县为代表的边疆少数民族地区,也创造了以上独具特色的爱国主义历史文化资源,不仅丰富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还体现了中华文明包容性的价值。这些资源既有古代和近代的文化遗存,也有西藏及涉藏州县爱国人士的爱国思想、传统和事迹,是中华民族共同记忆和共有精神家园的重要组成部分,能够回答用何种历史文化资源丰富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精神内涵并形成意识内核这一基本问题;是具有连续性与包容性、统一性与和平性等特性的爱国主义历史文化资源。其不论是内在逻辑还是外在形态,都完美切合了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意识要素的需要。

(一)爱国主义历史文化资源的连续性与包容性

“我国古代的精神文明及它所孕育出来的民族感情和爱国主义,是我们这个文明古国能够保持民族团结和国家长久统一的重要原因”。^⑤ 回顾历史,我们可以看到西藏及涉藏州县爱国主义历史文化资源形成过程与内容上的连续性与包容性。众所周知,最具代表性的当数西藏自治区拉萨大昭寺门前的“长庆会盟碑”(又称“甥舅会盟碑”和“唐蕃会盟碑”)。“长庆会盟碑”

^① 张学敏、胡雪涵:《形似神殊,共进协同: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与中国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之关系探析》,《西南大学学报》2023年第6期。

^② 青觉:《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内生性基础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20年第5期。

^③ 麻国庆:《记忆的多层性与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民族研究》2017年第6期。

^④ 青觉:《中华文明突出包容性的民族政治文化解读》,《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23年第4期。

^⑤ 姚公骞:《礼·精神文明·爱国主义》,《中国社会科学》1982年第5期。

是唐朝汉藏民族友好往来的一个重要历史见证。元代的“凉州会谈”(凉州会盟)也是西藏地方与祖国关系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大事件,产生了《萨迦·班智达致蕃人书》这一具有重要意义的历史性文献,以及甘肃武威白塔寺等历史文化遗存和后世不断配套修建的相关纪念馆。这些历史文献与遗存等是蒙藏民族共同缔造中华民族、发展民族团结关系的明证。史料记载,1246年,为了避免西藏地方与中央王朝发生冲突,年过六旬西藏宗教领袖萨班不畏万里征途,从萨迦到凉州,与蒙古汗国皇子阔端见面会谈,进行了一系列的磋商活动,并就关键性问题达成重要共识;藏文史料还称:“阔端甚喜,谈论了许多教法和地方风俗民情”,佛法也“得到王的敬信”。自此,中央王朝正式在西藏派官设治,清查户口土地、征收赋税、实施赈济、设置驿站、派遣军队。^① 元朝时期以《红史》为代表的典籍中,透露出浓厚的多民族史观及区域共同体认识等思想观念,为当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藏族历史文化的视角,也为增强“五个认同”中的中华文化认同提供了历史支撑。^②

清顺治九年(1652),五世达赖喇嘛赴京觐见,翌年二月,朝廷敕封五世达赖喇嘛为“西天大善自在佛所领天下释教普通瓦赤喇怛喇达赖喇嘛”,同时确认了格鲁派在西藏地方政权的主导地位。^③ 六世班禅额尔德尼入觐,是清代自顺治时五世达赖喇嘛入京以来的又一盛事,加强了西藏地方与乾隆时期中央政府之间的联系,书写了各民族密切交往的历史篇章,影响甚大,意义深远。^④ 两次觐见在京驻锡的西黄寺,以及讲经的雍和宫等历史文化遗存,是现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重要的历史证明。而晚清藏族的爱国主义文化遗存更为丰富,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藏族人民自强不息、百折不挠,为反对压迫和侵略前赴后继,形成了浓厚的爱国主义传统。其中,西藏各族人民抗击英帝国主义的两次入侵更是可歌可泣、气壮山河:1888年,英军发动第一次侵藏战争,西藏爱国军民识破“口蜜腹剑黄毛佬,远涉重洋霸天竺;行动诡谲似毒蛇,妄想侵吞我‘雪域’”^⑤的侵略者野心,上下一致表示:“纵有男尽女绝之忧,惟当复仇抵御,永远力阻,别无所思。”^⑥浴血奋战、誓死抵抗。由于敌我力量悬殊,隆吐山失守了,但中华民族抵御外族入侵、保卫国家的大无畏英雄气概将与世长存。1904年,英国发动第二次侵藏战争,西藏军民为维护国家的领土和主权完整,千余名英雄儿女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江孜地区设立的抗英纪念馆、抗英遗址,是重要的爱国主义历史文化资源,供后人参观瞻仰。^⑦ 虽然两次抗英斗争都失败了,但西藏军民用生命和鲜血书写了我国各族人民反帝斗争史中的光辉一章,江孜宗山抗英遗址不仅是藏族的爱国主义历史文化遗存,更保存了中华民族全体儿女的共同记忆。鸦片战争时期,从四川涉藏地区赴祖国东南沿海前线抗英的阿木穰、喀克哩等藏族将士英勇杀敌,壮烈牺牲,是中华儿女同帝国主义进行斗争的光辉典范。为了纪念英雄们的英勇事迹,东南沿海慈溪市民众专门修了一座庙,展示阿木穰、喀克哩等各族英雄的塑像和事迹(现为“鸦片战争宁波抗英事迹纪念馆”)。^⑧

① 陈庆英、张云、熊文彬:《西藏通史·元代卷》,中国藏学出版社2016年版。

② 罗宏:《14—16世纪藏文典籍之王统历史书写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启示》,《中国藏学》2023年第1期。

③ 邓锐龄、冯智主编:《西藏通史·清代卷(上)》,中国藏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77—79页。

④ 邓锐龄、冯智主编:《西藏通史·清代卷(上)》,第274—276页。

⑤ 西藏自治区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西藏文史资料选辑第七辑》(西藏人民抗英斗争史料专辑),西藏自治区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1985年,第21页。

⑥ 爻峰:《西藏历史概览》,《藏学研究文集》,民族出版社1985年版,第294页。

⑦ 邓锐龄、冯智主编:《西藏通史·清代卷(上)》,第521页。

⑧ 喜饶尼玛:《近代藏事研究》,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版,第59—64页。

红色文化资源也是爱国主义历史文化资源的重要部分,具有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历史印证与塑造认同等功能。如在红军长征途中,党领导藏族人民开展的诸多革命活动,特别是在这段历史时期中诞生的革命英雄及革命政权,是增强藏族群众对中国共产党认同的爱国主义印记。如四川甘孜县在旭日岭修建的“朱总司令和五世格达活佛纪念馆”已经成为一个很好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甘肃卓尼“杨土司革命纪念馆”(省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也反映了这个时期当地藏族土司杨积庆的深明大义。他无视国民党阻击红军的指令,暗中开仓供粮30余万担,指示当地群众抢修被破坏的达拉沟栈道和尼傲峡木桥,为红军突破天险腊子口提供了重要的帮助,还妥善安置红军伤病员数百人,为红军北上抗日做出了重要贡献。^①位于云南迪庆、四川甘孜与阿坝的红军长征纪念馆等,对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认同和中国共产党认同,以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也具有特殊的意义。1935年5月,红一方面军从四川宝兴县进入阿坝,途经和驻留于泸定、康定、丹巴、道孚、炉霍、甘孜、新龙、雅江、理塘、得荣、乡城、稻城、巴塘、白玉、色达十六个县;1936年7月下旬,红二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经过阿坝继续北上。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经过阿坝历时15个月。^②在长征中,红军不仅得到藏区各县人民的大力支持,还先后建立了多个地方党组织,获得了老百姓对中国共产党的高度认同,留下了具有历史意义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两河口会议、芦花会议、沙窝会议、毛尔盖会议和巴西会议会址,土门战役、包座战役遗址与遗迹等,它们分布于四川省小金县、黑水县、松潘县、若尔盖县、茂县、红原县等,向世人展示了中华民族的革命精神,奠定了藏族群众对中国共产党、中华民族认同的革命基础。为了类型化地充分发挥其历史印证与塑造认同功能,增强连续性与包容性,红色文化资源还可划分为烈士陵园、重要历史事件发生地遗址、对敌作战发生地、纪念碑类、综合性博物馆(纪念馆)、有历史性意义的重要项目建设等六大类型。^③

(二)爱国主义历史文化资源的统一性与和平性

“各民族交融汇聚成多元一体中华民族,从而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与发展,是构成中华民族的各种要素在历史发展中不断汇集的结果”。^④历史上,藏族与其他民族一起,在融聚中华民族共同体这一民族实体的过程发挥了合力作用,致力于中华民族共同体实体形成与发展的历史人物层出不穷,融聚的方向与目标充分体现了爱国主义历史文化资源的统一性与和平性。

体现古代西藏爱国主义历史文化资源的统一性与和平性的著名代表人物有萨迦班智达、八思巴、大宝法王得银协巴、大慈法王释迦益西等。1246年,八思巴·罗追坚赞随叔父萨迦班智达前往凉州,此后一直在内地辅佐忽必烈,完成元朝中央政府对西藏地方的治理体系建设。如1260年,忽必烈继任蒙古汗位后,封八思巴为国师,授命创制新蒙文,此后藏传佛教萨迦派领袖一直在元朝居于国师之位;忽必烈还在朝廷内设立总制院掌管全国的佛教事务和西藏地区的行政事务,八思巴被任命为总制院院务,后总制院改为宣政院,与枢密院、中书省、御史台并列,成为皇帝直接领导下的元朝中央四大机构之一;1264年,八思巴兼领总制院事,专管全国的佛教事务和西藏地方的军政事务;1269年,忽必烈将八思巴所创新字颁行全国,并规定今后诏书公文一律采用八思巴文;1270年,元世祖晋封八思巴为大元帝师、赐玉印;1276年,忽必

① 魏贤玲:《卓尼藏族研究》,民族出版社2010年版,第69—82页。

②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甘孜藏族自治州委员会编:《甘孜州文史资料》(第二十二辑),政协甘孜藏族自治州委员会,2005年,第1页。

③ 扎西:《西藏红色文化资源形态及其在高校爱国主义教育中的融合发展探究》,《西藏民族大学学报》2023年第5期。

④ 杨须爱:《各民族交融汇聚史知识再生产——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视角》,《民族研究》2021年第1期。

烈命太子护送八思巴回到萨迦寺;1280年,八思巴逝世后,忽必烈追封其为“皇天之下,一人之上,宣文辅治,大圣至德,普觉真智,佑国如意,大宝法王,西天佛子,大元帝师”。^①八思巴一生为维护祖国统一、西藏地方安定和各教派信仰自由等方面作出了卓越贡献,辅佐了元朝中央王朝对西藏等民族地区的治理,加速了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和中华民族“大一统”格局形成,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值得大力学习和宣传的爱国主义典范。

近现代西藏及涉藏州县的爱国主义代表人物更为众多,如九世班禅、十世班禅、阿沛·阿旺晋美、天宝以及格达活佛、喜饶嘉措等,他们的事迹是各民族融聚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典范。

九世班禅1923年由西藏进入内地,1937年圆寂于青海玉树。他面对帝国主义入侵的威胁,积极为中华民族救国图存贡献了自己最大的力量,在救亡图存中促进了各民族文化的交流。他在圆寂前说:“余生平所发宏愿,为拥护中央,宣扬佛化,促成五族团结,共保国运昌隆,近十五年来,遍游内地,渥蒙中央优遇,得见中央对佛教尊崇,对藏族平等,余心滋慰,余念益坚,此次奉派宣化西陲,拟回藏土,不意所志未成,中途圆寂,今有数事切嘱如下:……至宣化使署枪支,除卫士队及员役自卫者外,其余献予中央,共济国难,俟余转生,再请发还,又关于历代班禅所享权利,应早图恢复,最后望吾藏官民僧俗,本中央五族建国精神,努力汉藏和好,札萨喇嘛及各堪布,尤宜善继余志,以促实现。此嘱。”^②九世班禅反对侵略战争的爱国主义思想,以及他一系列的爱国事迹,让不少国人形成了一种爱国自觉,为现代西藏及涉藏州县的宗教人士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历史榜样。^③同时,也为促进藏传佛教中国化,发扬爱国主义思想,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增进各民族的和谐与团结,提供了凝心聚力的典范。

五世格达活佛法名洛桑登真·扎巴他耶,1902年出生于甘孜县白利乡,格达寺活佛。红军长征经过甘孜时,格达活佛将白利寺所存青稞3万余斤,豌豆4000多斤拿出来支援红军,并动员积极发动和组织群众为红军筹备粮草,为红军长征顺利走出四川涉藏州县发挥了积极作用。格达活佛支持红军的行为和对中国共产党的认同得到了红军高层领导的关注,朱德总司令曾亲自到白利寺去看望这位开明的佛教界爱国人士;1936年6月,中华苏维埃博巴政府在甘孜成立,格达活佛不仅被选为副主席,还被誉为“红军朋友,藏人领袖”;1950年3月西康解放,格达活佛先后被任命为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西康省人民政府副主席、康定军事管制委员会委员、西南民族事务委员会委员等职务。为了向西藏地方政府宣传中央政府和解放西藏的有关方针政策,格达活佛不畏各种艰难险阻,主动请缨前往拉萨。到达昌都后,不顾旅途疲劳立即四处奔走,向昌都地方当局和各族各界人士宣传讲解《共同纲领》和党的方针政策,受到了当地绝大多数上层人士和僧俗群众的拥护。^④

喜饶嘉措是藏传佛教格鲁派著名高僧,1884年出生于今青海省撒拉族自治县道帛乡,先后在青海道帛乡的古雷寺、甘肃甘南拉卜楞寺和西藏的哲蚌寺学经,33岁时获拉然巴格西学位。1936年,喜饶嘉措应国民政府教育部和蒙藏委员会的邀请,在黎丹^⑤等人陪同下,由拉萨

① 陈庆英、高淑芬主编:《西藏通史》,中州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第167—244页。

② 边疆半月刊社主编:《班禅遗囑译文》,《边疆半月刊》,1938年第3卷第7—9期汇刊,第6页。

③ 蒲生华:《北洋政府时期九世班禅的和平呼吁及其时代意义》,《中国藏学》2022年第2期。

④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甘孜藏族自治州委员会编:《甘孜州文史资料集萃》(第一辑),政协甘孜州藏族自治州委员会,2008年,第150—157页。

⑤ 黎丹(1865—1938),字雨民,号无我,湖南湘潭人。1918年任西宁道尹。1930年任青海省政府委员兼秘书长。1933年,为国民政府监察院委员。1934年率“青海巡礼团”至西藏,为维护国家主权,民族文化交流做了大量工作。

出发,取道印度,途经香港、上海到达南京,受到蒋介石、林森等国民政府首脑人士的接见。他在南京中央大学、上海大菩提学会等处举行报告会,引起了强烈的社会反响。抗日战争爆发后,喜饶嘉措大师不辞辛劳,带领抗战宣传团走遍甘肃、青海等广大蒙藏地区,发表了《为宣传抗战告蒙藏群众书》和《白法螺的声音》等,愤怒谴责日寇的侵略罪行。期间,他还多次被推选为国民参政会参政员。1940年,国民政府册封大师为“辅教宣济禅师”并授大小银印两枚。新中国成立后,喜饶嘉措对中国共产党高度认同,积极为人民服务。1949年12月,青海省人民政府成立后,他出任了第一届政府副主席;1950年,又任西北军政委员会委员、西北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1953年5月,中国佛教协会成立任第一副会长;1955年8月,当选为中国佛教协会会长;1956年9月,中国佛学院在北京成立,兼任院长,并亲自给藏语班授课,要求僧俗学员不仅要精研佛典、深入教理、提高文化素质,还要注重爱国爱教、德行戒律的学习。此外,他还校审了全国政协一届一次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指导翻译了1954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一届一次会议通过的第一部宪法藏文版;后来又参加了《毛泽东选集》藏文版的翻译审定工作;还积极参与了西藏和平解放事业。1950年秋,他多次写信给他在西藏的故旧和学生,亲自向西藏发表广播讲话,说明当时国内形势发展情况,宣传党的民族宗教政策。^①

除了上述著名的藏族爱国人士外,一些曾经活动在西藏和涉藏州县的其他民族爱国人士,也是当下增强“五个认同”,促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所应记述的爱国主义历史人物。如第一个在涉藏地区工作的中共地下党员宣侠父,^②1925年春,受党组织派遣到李大钊处工作,经李大钊推荐,以左派国民党员身份,前往张家口冯玉祥部做政治宣传工作;同年8月,随冯玉祥部第二师师长刘郁芬西征甘肃;1925年夏,他会见了前来兰州控诉青海马家军阀的拉卜楞寺代表黄正清等,积极支持他们的“反马”活动,向他们宣传民族平等思想,协助他们成立了“藏民文化促进会”;1926年夏,作为甘肃督办代表前往甘南地区,耐心听取各界人士的意见和要求,鼓励藏族僧俗加强团结,坚决反对军阀压迫。在玛曲欧拉,他受到嘉木祥活佛父亲黄位中的热情接待,深入交谈后了解到封建军阀马麒在甘南犯下的种种恶行和藏族群众被残酷盘剥及压榨的内情,据此提出了组织甘青藏民大同盟的建议,并立即起草了《甘青藏民大同盟成立宣言》;随后,许多藏族头人纷纷拜访,明确表示接受他“团结起来,自求生存”的忠告,而且,为表心迹还赠送了银元和土特产。对于所赠钱财,他再三推辞不成,只好带回兰州捐赠兰州革命青年周报社。从甘南回到兰州后,他立即为藏民起草了《甘边藏民起诉国人书》,以恳切的语言、犀利的笔锋,淋漓尽致地揭发、控诉了军阀马麒在甘南犯下的种种罪行,该起诉书不仅在省内散发,还寄往全国各地,使马麒等封建军阀惶恐不安。之后,他经过多方奔走,积极做各方面的工作,迫使马麒退出拉卜楞寺,结束了封建军阀对甘南涉藏地区的剥削和压迫。^③宣侠父的言传身教对拉布楞地区藏族首领黄正清等很有重大影响,如黄正清不仅称他为“良师益友”,还追随其足迹走上了争取统一性与和平性的革命道路。

^①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青海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青海文史资料选辑》(第八辑),青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4—36页。

^② 宣侠父(1899—1938年),原名尧火,号剑魂,诸暨人。曾以甘肃督办代表身份,深入到甘南藏区,调查研究,帮助该地区人民反对军阀压迫。抗战期间,任十八集团军高级参议,专门从事国民党上层人士的统战工作。1938年7月31日,被国民党特务秘密杀害于西安。

^③ 黄正清:《追怀我的良师益友——宣侠父同志》,《甘南文史资料》(第四辑),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甘南藏族自治州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1985年,第9—10页;宣侠父遗稿:《俄拉草地的蹄迹》,《甘南文史资料》(第四辑),第16—42页。

综上所述,“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形成和发展中,各民族的差异性并没有被消解,而是始终在保持其张力的同时被共同性所超越”,^①因此,“中原文化与边疆各民族文化这种持续双向的交融与辐射,使得中华民族能够与中华文明一道,遵循一种‘日新’进取的行动论逻辑而非僵硬固化的结构论逻辑,持续去粗取精和博采众长,从而不断向更大范畴和更优状态调适发展”。^②其中,红色文化资源“蕴含着中华民族团结奋斗的精神密码、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伟大智慧和中华民族繁荣发展的前进力量”。^③宝贵的爱国主义历史文化资源,不仅创造了属于中华民族的集体记忆,还树立了藏族群众对国家认同的精神支柱,为新时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进程提供了心理支撑。^④西藏和平解放以后,特别是民主改革以来,西藏人民在社会主义祖国大家庭中,继承与发扬爱国主义精神,通过各种渠道与措施,不断丰富与发展爱国主义历史文化资源,继续推动新时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自觉发展。^⑤

三、融入逻辑:爱国主义历史文化资源促进 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五个维度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⑥“两个结合”论断为爱国主义历史文化资源缘何融入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提供了答案。2023年12月,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30周年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将“两个结合”与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背景相联系,再次强调:“我们要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深入探索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规律,不断回答实践遇到的崭新课题,以理论创新引领实践创新。”^⑦从现实来看,第二个结合巩固、丰富、明确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主体性、历史实在性和未来指引性,深化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理论逻辑,^⑧加速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带领各族群众实践的进程,促进了马克思主义“五观”(国家观、民族观、历史观、文化观、宗教观)等理论在中国的不断丰富和发展。从历史观来看,西藏及涉藏州县爱国主义历史文化资源,是各民族交流交往交融的历史实证,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历史根脉;从文化观来看,人民群众的生产活动对社会存在和发展起着推动作用,增强文化认同是增强各民族文化自信的重要方式。从国家观层面来看,爱国主义历史文化资源强化了各族群众对伟大祖国认同,筑实了爱国主义思想对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价值支撑;从民族观层面来看,爱国主义历史文化资源优化了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的民族工作,在促进民族团结进步工作的同时,提升了党

① 李志农、高云松:《云南迪庆各民族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生成研究》,《民族研究》2022年第6期。
② 青觉、吴鹏:《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发展的历史逻辑与当代价值》,《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2022年第2期。
③ 刘强勋、刘宇杰等:《红色文化资源融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路径研究》,《广西民族研究》2022年第6期。
④ 郭人豪、张积家:《集体记忆与国家认同——以推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视角》,《中国藏学》2021年第1期。
⑤ 张洪伟、巩紫婉:《西藏和平解放时期群众工作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历史贡献》,《西藏民族大学学报》2022年第5期。
⑥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21年7月1日。
⑦ 习近平:《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3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23年12月27日。
⑧ 青觉:《推进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系列访谈之一》,《中国民族》2023年第6期。

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过程中对各民族群众的领导力。^①因此,基于“两个结合”,从理论逻辑的角度看,西藏和涉藏州县的爱国主义历史文化资源具有夯实历史根基、深化文化认同、丰富价值意义、培育主线思维、提升党建效能五个维度架构路径,可以揭示我国边疆地区爱国主义历史文化资源融入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理论逻辑。

(一) 夯实历史根基:丰富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历史底蕴

“我国的多民族国家是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各族劳动人民共同创造建设出的统一不可分割的整体格局”。^②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在中华民族的形成与发展进程中一直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是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历史资源较为丰富的地区,拥有较为显著的民族特性。八思巴等各民族代表人物及历史上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重要事件,记载了历史上各民族交往交流的事实,反映出中华民族整体凝聚发展的历程,作为具有典型性的历史文化资源,体现出不同历史时期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中央第七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就挖掘、整理、宣传西藏自古以来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事实作出要求,从引导各族群众看到民族的走向和未来的角度,要求要深刻认识到中华民族是命运共同体,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③追根溯源,旧石器时期,青藏高原这片土地上,就有了通过人类活动形成的历史交流路线;四世纪之后小部落联盟的交往交流交融活动促进了各部之间的了解、接触与和同,为参与中华民族实体形成和发展的进程提供了基础条件。松赞干布时期西藏地方统一后,通过亲近和睦的政策与中央王朝建立联系,这一时期交往交流交融持续增多,加速了中华文化、中华文明的交融进程。^④以吐蕃王后后裔唃廝囉政权为代表的地方政权依旧与中央王朝保持着商贸联系,使得藏族同胞与中华民族各民族同胞的交往交流交融活动可以延续。元代以后,中央政府对西藏地方实施了行政管理,西藏作为统一多民族国家的组成部分,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进一步加强了与全国其他地区及民族的密切联系。清朝加强了对西藏地方的治理,各民族之间联系紧密,交往互动频繁,共同性不断增加。

近代以来,中华各民族同胞一起争取民族独立,推翻“三座大山”,实现翻身解放、人民当家作主。民主改革后,西藏的社会形态从农奴制到社会主义发生了跨越式的转变。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树立正确的中华民族历史观,明确了中华民族的历史是各民族共同书写的这一事实。在新时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党的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的工作背景下,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强调:“必须顺应中华民族从历史走向未来、从传统走向现代、从多元凝聚为一体的发展大趋势,深刻理解把握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不断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奠定坚实的精神和文化基础。”^⑤相较旧西藏时期,近代、现代以来形成的历史文化资源,多了一份爱国主义色彩,内涵更为丰富。尤其是藏族民众与全国各族民众并肩奋战,共同抗击帝国主义入侵,形成了具有爱国主义精神的集体记忆,为

^① 刘玉:《西藏高校思政课铸牢大学生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探析——以〈马克思主义“五观”教育概论〉为例》,《西藏大学学报》2020年第2期。

^② 陶明:《试论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民族研究》1959年第9期。

^③ 《习近平在中央第七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上强调: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 建设团结富裕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人民日报》2020年8月30日。

^④ 巴卧·祖拉陈哇著,黄颢译注:《〈贤者喜宴〉摘译(三)》,《西藏民族学院学报》1981年第2期。

^⑤ 习近平:《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推进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求是》2024年第3期。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丰富了历史底蕴,提供了历史借鉴与实践原则。^①因此,各民族在书写中华历史的过程中形成的爱国主义历史文化资源是不可再生、不可替代的,是承载着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实证。^②西藏及涉藏州县的爱国主义文化资源与广大藏族人民生活的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息息相关,产生的爱国主义历史文化资源能够较好地还原历史场景,使民众产生亲切感,犹如身临其境。如继续对红二、四两大主力红军在甘孜会师,凝聚力量北上的历史事迹加大宣传,邀请相关人士前往甘孜等地参观学习,感受藏汉各民族团结一心争取民族解放的历程,增加对红军长征的感性认识。让各族群众目睹实情、触摸史实,由现象到本质,进一步激发爱国主义,增强各民族对伟大祖国、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华民族的认同,从历史维度助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

(二)深化文化认同:增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文化认同和自信

中华文化是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坚实基础,各民族在交往交流交融中形成的爱国主义历史文化资源,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萌发的基础。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是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孕育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③以《萨迦班智达致蕃人书》为代表的爱国历史文献,透露出了萨迦班智达作为地方领袖的政治担当和家国情怀,凉州会谈后西藏接受中央政府的管辖,得到了长足的发展,此后西藏地方再也没有发生过长时间的分裂割据。^④西藏及涉藏州县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中,形成了有着爱国主义思想的深层文化心理,体现在一系列历史文献、典籍、诗歌、音乐、美术等爱国主义历史文化资源中,在全国范围内具有典型性,这些爱国主义历史文化资源与各民族的历史文化遗产资源共同铸就了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注入了内在动力,增强了中华儿女的文化自信和文化认同,^⑤回应了认同建构说与政治发展说的重要观点:“国家认同就是国家建设本身的问题”,^⑥“依靠民主方式处理族际关系,不仅可以获得国家政治统治的合法性,更重要的是可以获得各族人民的真正认同与社会整体的和谐统一”。^⑦

(三)丰富价值意义:强化爱国主义思想对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价值支撑

列宁曾说:“爱国主义是由于千百年来各自的祖国彼此隔离而形成的一种极其深厚的感情。”^⑧2023年10月,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六次会议表决通过了《爱国主义教育法》,进一步明确了这种“深厚的感情”的具体范畴。^⑨其中第六条明确提到,包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祖国的壮美河山和历史文化遗产;英雄烈士和先进模范人物的事迹及体现的民族精神、时代精神和其他富有爱国主义精神的内容,都属于爱国主义教育的内容,而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历史文化资源基本全部包含上述内容。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

① 李闫如玉:《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历史借鉴与实践原则》,《思想教育研究》2023年第8期。

② 陈文元:《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内生动力与现实路径——基于发挥民族历史文化遗产作用的视角》,《青海社会科学》2023年第1期。

③ 习近平:《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推进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求是》2024年第3期。

④ 班玛更珠:《论萨迦班智达的家国情怀——再读〈致蕃人书〉和〈萨迦格言〉》,《中国藏学》2017年第4期。

⑤ 郝时远:《文化自信、文化认同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南民族大学学报》2020年第6期。

⑥ 林尚立:《现代国家认同建构的政治逻辑》,《中国社会科学》2013年第8期。

⑦ 王建娥:《族际政治民主化:多民族国家建设和谐社会的重要课题》,《民族研究》2006年第5期。

⑧ 列宁:《皮季里姆·索罗金的宝贵自供(1918年11月20日)》,《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579—580页。

⑨ 《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六次会议在京闭幕》,《人民日报》2023年10月25日。

大报告中明确提出要“用好红色资源,深入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宣传教育,深化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教育,着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① 2013年3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爱国主义始终是把中华民族坚强团结在一起的精神力量。”^②爱国主义历史文化资源,形成新时代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巩固和发展爱国统一战线的动力支撑,对于增强民众对我国爱国主义思想历史传承的认识,全面树立民众爱国主义思想自然是必不可少的。以西藏及涉藏州县为代表的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有着独特的人文环境和外部挑战,将当地爱国主义历史文化资源深度融入爱国主义教育体系中,可以更好地战胜国内外因素影响下产生的狭隘民族主义思想,以及外部势力的干扰,培育深化国家情怀。同时,新时代爱国主义思想对于增强“五个认同”,扫清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干扰因素有着不可替代的关键作用。^③从价值维度来看,爱国主义历史文化资源是增强“五个认同”,强化新时代爱国主义思想,展现中华文化及中华文明,透析中华民族历史,加速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价值支撑。

(四) 培育主线思维:推动新时代以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为主线的民族团结进步工作

中央民族工作会议提出“十二个必须”,其中之一是“必须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教育引导各民族继承和发扬爱国主义传统,自觉维护祖国统一、国家安全、社会稳定”。^④循此,2022年12月,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作出《关于表彰西藏自治区民族团结进步模范集体和模范个人的决定》,共有150个模范集体、200个模范个人被表彰。他们的民族团结进步事迹、工作都是历史的见证。被表彰的卓嘎等人不仅是爱国守边精神的代表,而且是推动新时代以铸牢中华民族共意识为主线的民族团结进步工作的模范,他们的英雄的事迹会写进课本,而诸如卓嘎手中的红旗等相关物品会放进博物馆,丰富爱国主义历史文化资源,在未来为各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活动指明方向。2020年2月28日,国家民委等四部门印发《关于进一步做好新形势下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的指导意见》,提出当下民族团结进步工作仍然是促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和发展的一个重点。同时《关于进一步做好新形势下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的指导意见》中还提到了在进行民族团结进步工作时,要不断增强“五个认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将西藏及其他涉藏州县的爱国主义历史文化资源纳入民族团结进步工作中来,一方面可以搭建促进各民族沟通的文化桥梁,构建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另一方面,从2019年至2023年,立法促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呈现出由民族自治地方立法向全国全面铺开的新局面,民族自治地方的相关立法多数是以民族团结进步为主题。以《玉树藏族自治州民族团结进步条例》为例,其中就提到了要加强“五个认同”,将民族团结进步教育作为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内容,坚持打牢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意识基础;再以《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红色资源保护传承条例》为例,法条把具有红色基因的民族文化,纳入拥有历史价值、纪念及教育意义的物质资源和精神资源当中。以西藏及涉藏州县为代表的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爱国主义历史文化资源中,有些历史事件、历史人物,本身就是在对伟大祖国有强烈认同的背景下,在进行民族团结进步工作时形成的。如1994年9月,“老西藏精神”的代表人物孔繁森被国务院授予“全国民族团

^①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22年版,第44页。

^② 《凝聚起中华儿女团结奋斗的磅礴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弘扬爱国主义精神重要论述综述》,《人民日报》2021年10月2日。

^③ 康锐、薛曼:《新时代爱国主义思想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价值支撑》,《四川民族学院学报》2023年第1期。

^④ 《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 推动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光明日报》2021年8月29日。

结进步先进个人”称号。因此,充分利用藏族本土的爱国主义历史文化资源,可以增强藏族群众的“五个认同”,对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的民族团结进步工作起到助推作用。

(五)提升党建效能:强化党对新时代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领导力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强调:“全党要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树牢群众观点,贯彻群众路线。”^①而且,“中华民族的爱国主义传统是中华各民族共创共传共享共荣的传统”。^②在新时代,“只要高举爱国主义的伟大旗帜,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就能在改造中国、改造世界的拼搏中迸发出排山倒海的历史伟力”。^③总体看,近现代创造藏族爱国主义历史文化资源的主体是人民群众。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就积极争取少数民族,在各民族平等的原则下联合抗日,激发最广泛的爱国主义,20世纪40年代中国共产党对“两种民族主义”进行了最直接的批判,消除民族分离主义的环境土壤。^④新建立的百万农奴解放纪念馆等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丰富了藏族爱国主义历史文化资源。进入新时代以来,党的群众观在民族工作中得到了高质量的发展,不仅让西藏的社会形态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还开辟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新境界,并且为一个国家处理多民族的民族关系提供了经验和启示。^⑤此外,党在保护爱国主义历史文化资源,特别是红色资源方面,起到了积极的引领作用。以西藏为例,第一到第七批的全国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名单有江孜抗英遗址、拉萨烈士陵园、西藏博物馆、西藏百万农奴解放纪念馆、昌都革命历史博物馆、江达县岗托十八军军营旧址、全国援藏展览馆、清政府驻藏大臣衙门旧址陈列馆等,在得到了国家层面的认可和保护的同时,以职能部门和所在社区为依托,集合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各项工作与各环节,深度挖掘整理与分众化传播“红色传统与基因中的民族团结与共同繁荣以及和谐民族关系的元素”,并嵌入构建“大党建”工作新格局与谋划基层治理“一盘棋”体系中,形塑“党建+多元融合”的“党建效能”提升的新模式与路径。如“老西藏精神”在全国的红色资源中就具有显著的代表性。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第六次、第七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上强调要发扬优良传统,发扬“老西藏精神”,鼓励西藏广大干部群众不忘红色传统、永葆革命本色,为建设团结富裕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而不懈奋斗。^⑥可见,“老西藏精神”不仅是扎根雪域高原的红色传统,而且可以作为边疆地区基层治理体系中爱国主义历史文化资源融入新时代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以及高效能党建引领高效能基层治理实践的价值引领。

四、融入机制:边疆爱国主义历史文化资源嵌入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保障

“中华民族共同体既是多元民族互惠共生的族类共同体,又是各个公民相亲相爱的公民共

①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第70页。

② 王珍、向建华:《新时代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爱国主义传统》,《民族研究》2022年第1期。

③ 《习近平在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9年5月1日。

④ 张淑娟:《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对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的形塑与修正——以中国共产党为例》,《广西民族研究》2018年第3期。

⑤ 孙绍勇:《党的群众观在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中的生动实践》,《中南民族大学学报》网络首发,2023年7月11日。

⑥ 闫若之:《“老西藏精神”:扎根雪域高原的红色传统》,《中国民族报》2021年6月1日。

共同体。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目标导向,就是引导各民族超越小我身份的束缚,而将自我的政治忠诚指向更为宏阔的大我身份。这就决定了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必须整合各民族成员多元而弥散的身份认同,推动各个民族群体形成共有的无差别的公民身份。唯有如此,各民族群体才会生成深厚的宪法爱国主义,并在公民责任伦理的激活之下,自觉献身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壮丽事业”。^①而教育、宣传、法治是新时代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民族团结进步、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重要工具,拥有一体三面的特性,三个层面的机制不仅可以独立运行,在特定条件下还可以交叉运作,不论是爱国主义教育法治化、宣传教育机制一体化、法治教育宣传常态化等,都直接或间接地推动了爱国主义历史文化资源融入爱国主义教育、民族团结进步和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同频共振,凝结出协同高效的链接或嵌入机制,推动相关元素在实践中达到和谐。

(一)教育传承机制:将爱国主义历史文化资源纳入爱国主义教育体系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第七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上提出:“要重视加强学校思想政治教育,把爱国主义精神贯穿各级各类学校教育全过程,把爱我中华的种子埋入每个青少年的心灵深处。”^②同时提到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增强“五个认同”,并将其与爱国主义精神、新时代教育工作结合论述,为爱国主义历史文化资源纳入爱国教育系统提供了明确方向和依据。因为,爱国主义主要“从公民认同的角度出发,让公民在理性认知与角色行动之中形成对国家的认同,形成一种‘公民—国家’的认同模式,即‘公民身份—国家制度法规—公民权利义务—爱国行动’”,^③这种认同模式以“‘中华民族’为核心,重在强调‘国家民族’的建构,即通过借助历史记忆与中华文化阐明中华民族的发展历程与演变轨迹,同时又以民族主义式的情感表达赋予中华民族以崇高性,将民族成员与中华民族、伟大祖国联结成一个命运共同体”。^④从整体来看,爱国主义历史文化资源不仅是文化传承机制的重要载体,还是新时代教育工作的重要依托,在丰富教育工作内涵的同时,对推进爱国主义教育法治化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2023年10月24日,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六次会议表决通过的《爱国主义教育法》,标志着爱国主义教育彻底融入了法治运行的范畴,进而从更高维度对相关工作进行保障。以西藏及涉藏州县为代表的边疆民族地区爱国主义历史文化资源,不仅是新时代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历史线索,还从历史维度构建了“天然”的教育资源库,为各级各类学校的教育工作,尤其是广大青少年构建爱国主义精神的进程提供了实践依据,支撑起了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与民族团结进步工作的法治体系,但还需要从以下方面入手:

一是从以西藏及涉藏州县为代表的前述边疆民族地区的爱国主义历史文化资源中,选择主题鲜明、影响较大的事件和典型人物编进中小学语文课本中,或者写成专门的辅助教材和课外读本。通过文化的“高度整合实现内在心理的畅通,有形的红色文化空间承载了无形的革命斗争精神,有形(外在文化)与无形(内在精神)的有机结合,正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生死与共’的价值阐释”。^⑤因此,边疆民族地区的教材必须保证“四个与共”“四个共同”关键

^① 朱碧波:《中国式现代化引领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研究》,《学术界》2023年第11期。

^② 《习近平在中央第七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上强调: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 建设团结富裕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人民日报》2020年8月30日。

^③ 施展:《枢纽:3000年的中国》,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1年版,第75页。

^④ 查火云、郑航:《当代中国爱国主义教育的话语分析:国家认同的视角》,《教育学报》2010年第6期。

^⑤ 马伟华、顾旭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基于红色文化资源价值内涵与传承利用的分析视角——以云南双江为例》,《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2022年第4期。

价值观的正确,辅助教材要注意和国家各种爱国主义教育相关教材的有机结合,与课程适配;此外编纂的教材要注意在教学实践中不断修正完善,突出加强民族团结的部分,在挑选具有地域特点的爱国主义资源时需要谨慎,避免“两个主义”以任何形式出现在教材当中,确保质量过关。同时,辅助教材和课外读本的编写要注意不同受众群体的文化层次,应该对小学、中学、大学进行分级,针对不同层次的受众选用不同素材。在具体撰写上,中小学用书适宜侧重于简单介绍,大学用书适宜侧重于分析研究;加大国家通用语言的普及,使广大青少年能更直接、更容易读懂和了解爱国主义历史。

二是灵活开展实践教育。爱国主义教育对于强化学生的爱国主义思想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将红色文化资源融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以坚定公众理想信念、树立文化自信、增强使命意识与责任担当,批判各种谬误,巩固意识形态安全,共创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①特别是以西藏及其他涉藏地区的六类爱国主义历史文化资源为主题,开展类型化的实践教育。就实践教育的形式而言,可以开展实地参观调研,结合历史资料撰写论文、介绍性文章,开展图片展;也可以编演话剧、开展演讲活动等。此外,还可以组织边疆少数民族地区青少年进京、内地学生到少数民族地区交流等夏令营活动,尽力让更多学生参与社会实践的交流,使他们在这种交流中得到教育,真正懂得、感受到“三个离不开”(汉族离不开少数民族,少数民族离不开汉族,少数民族之间也互相离不开)的现实意义。

(二)宣传引导机制:将爱国主义历史文化资源并入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常态化宣传机制

习近平总书记对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②第五次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构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宣传教育常态化机制,纳入干部教育、党员教育、国民教育体系,搞好社会宣传教育。”^③从宣传教育的内在需求上来看,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是党提出的最新的民族理论政策之一,要加大相关概念和核心内涵的阐释,并提升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在各项工作中的重要性,包括西藏及涉藏州县历史文化资源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宣传时的融汇、协调和统一。其宣传工作在保持常态化进行的时候也具有艰巨性。^④可从以下方面切入:

一是进一步明晰爱国主义历史文化资源的宣传主体和受众主体,有针对性地开展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常态化宣传工作。目前,在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宣传工作中,存在着宣传主体身份模糊和接受宣传主体身份单一的问题。^⑤在宣传主体方面,应当进一步明确相关主体在宣传时的主要任务、组织保障、监督责任、考核奖励方式,细化相关主体在宣传工作中的分工和权利义务,在面对不同的受众主体时要确定相应的宣传主体,要善于利用基层组织的力量进行

^① 刘强勋、刘宇杰等:《红色文化资源融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路径研究》,《广西民族研究》2022年第6期。

^② 习近平:《论党的思想工作》,中央文献出版社2020年版,第10页。

^③ 《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推动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人民日报》2021年8月29日。

^④ 郝亚明、秦玉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宣传教育:内在需求、基本特性与实践方向》,《湖北民族大学学报》2023年第4期。

^⑤ 李秋丽、张梦潇、王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宣传教育的现实困境与优化路径——基于5W传播模式》,《青海民族大学学报》2023年第1期。

常态化的宣传。在受众主体层面,党员干部、学生群体和西藏及涉藏州县的群众依然是宣传工作的重要对象。除此之外,要打破宣传的壁垒,对少数民族流动人员,其他少数民族地区、非民族聚居区的少数民族群众和普通百姓进行强化宣传,建立全面而完善的历史文化资源宣传机制。

二是优化宣传的方式和路径,采用全媒体融合、精准网络推送等科学的宣传方式,加强宣传内容的质量。针对不同接受宣传的群体,要采用不同的宣传方式,特别是要关注年龄、地域、性别、职业等层面的差异性,利用区块链技术和大数据分析等手段,对西藏及涉藏州县的主体进行精准推送。同时,也要加强新媒体和传统媒体宣传结合,定期举办和历史文化资源有关的线下活动。在宣传内容层面,要始终围绕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工作部署和理论政策,以加强“五个认同”为基准,推进各民族成员构建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要处理好西藏及涉藏州县的历史文化资源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关系,在宣传工作中打造各民族共享的中华文化符号和中华民族形象,同时,“坚持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来认识和阐述历史,加强对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历史特别是多元一体格局形成脉络的系统梳理,挖掘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事实和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发展逻辑”。^①

三是关注宣传引导工作的效果。在对西藏及涉藏州县的历史文化资源进行宣传时,要主动寻找宣传引导工作中的问题,在找到问题后要及时反馈并记录;要建立和完善宣传效果的评估机制,把宣传引导工作进一步细致化、标准化。

(三) 法治化保障机制:将爱国主义历史文化资源融入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法治化进程

法治化保障机制需要以人民为中心依法构建,“保障性的现代国家民族事务治理体系,借助政党—国家的组织化形态、通则性的法治化体系、动力性的民主化体制、基础性的民生类制度及共通性的精神家园来形成规范预设的保障;同时,以人民为中心拓宽行动性的实践路径,借助全民教育、生活事件、公共治理、普惠政策、群众路线等来实现规范预设”。^② 具体而言,将爱国主义历史文化资源融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法治化的进程中,应当立足于立法工作、法律实施、效能评估、民族事务、普法宣传五个维度,^③把爱国主义历史文化资源作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重要动力。2023年3月,《立法法》的修订不仅明确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法治化的路径,同时给出了将爱国主义历史文化资源融入其中的法律依据。《立法法》第八条即规定,“立法应当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目前,我国共有六部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完整性写入的法律,对利用爱国主义历史文化资源结合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进而培养爱国主义精神,起到了间接的促进作用。如《家庭教育促进法》第16条要求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对未成年人行使家庭教育义务时,要帮助未成年人树立维护国家统一的观念,同时培养家国情怀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从法治角度出发运用藏族爱国主义历史文化资源,还需要从以下维度深入:

一是细化宪法中的内涵、遵循宪法中的规定。宪法是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地方立法的根本遵循,虽然宪法没有直接写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但有学者认为“中华民族”“民族团

^① 王延中:《深入推进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贵州民族研究》2023年第1期。

^② 青觉、徐欣顺:《新时代多民族国家建设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以人民为中心的理论与实践》,《民族研究》2021年第1期。

^③ 边巴拉姆、嘎松泽珍:《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法治保障的西藏实践与完善路径》,《中国藏学》2022年第3期。

结”“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民族关系”等语词,已经包含或解释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丰富内涵。^①此外,宪法第22条明确规定了国家要保护名胜古迹、珍贵文物和其他重要历史文化遗产,为爱国主义历史文化资源融入、参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法治化进程提供了相应的宪法依据。宪法还提到了要对广大人民群众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参与爱国统一战线巩固和发展的爱国者、人民群众在今后也将进一步发挥重要作用等表述。在未来,包括藏族在内的各民族群众,应该把爱国主义历史文化资源中有关爱国主义、历史记忆、悠久文化的内容与宪法中的相关概念、内涵结合理解,深入进行学习和贯彻,依法确保藏族群众可以准确理解“增进共同性、尊重和包容差异性”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基本原则,并“妥善处理好民族多样性和中华民族整体性的关系,捍卫宪法权威,坚决反对一切形式的民族利己主义和民族歧视”。^②

二是避免在相关立法中只是笼统地纳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表述,增强与爱国主义历史文化资源保护的协调性和可操作性。目前,我国现行法律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立法表述,主要呈现为由民族自治地方立法向全国全面铺开的局面,大多以民族团结进步法律为载体,但基本是简单地在法律中标明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词句。^③在未来的立法中,西藏及其他涉藏州县相关法律,可以借鉴《黄河保护法》将黄河文化的认同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相结合的做法,在立法中设置以当地爱国主义历史文化资源促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内容,包括如何保护、利用、深化的具体路径。此外,还要大力提升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法治化过程中各主体的立法水平。通过国家法律法规数据库进行检索,党的十九大以来部分地区的地方性法规,依然存在将“铸牢”错用成“筑牢”的情形。在对爱国主义历史文化资源保护进行法治保障建设时,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应当发挥主观能动性,结合自身地域特点进行立法编纂、创新,避免各类文件的直接引用。通过系统完备的法治建设,确保“有针对性地破解矛盾,融主体和客体为一体,积极营造共居、共学、共事、共乐的社会环境,让少数民族流动人口进得来、留得住、融得进、有发展,有效开创各民族群众和睦相处、和衷共济、和谐发展的良好局面”。^④

三是在爱国主义法治宣传中突出爱国主义教育历史文化资源,用爱国主义教育历史文化资源支撑宣传中的相关理念。“做好民族工作,人心是最大的政治;搞好民族团结,最管用的是争取人心”。^⑤因此,相关普法主体应当以“以法润心”为导向,加大对民族团结进步工作和宪法的宣传,重点要突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和爱国主义人物事迹,加大对爱国主义历史文化资源的利用,强调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民族自治地方,借助各地出台的《法治宣传教育条例》与《爱国主义教育法》第十四条关于国家采取多种形式开展法治宣传教育的具体内容,宣传民族爱国先进人物深化践行“五个认同”,以及参与打造中华民族大家庭的优秀案例,严厉打击民族分裂行为、民族极端对立行为,把握人民群众的力量,推动各族群众的学习自主性,加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

① 宋才发:《法治视角下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青海民族大学学报》2021年第4期。

② 王延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设中华民族共同体》,《民族研究》2018年第1期。

③ 乔良、朴宗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立法问题探讨》,《湘潭大学学报》2022年第3期。

④ 徐平:《在深化交往交流交融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以北仑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城市融入为例》,《民族研究》2021年第2期。

⑤ 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编:《中央民族工作会议精神学习辅导读本》,民族出版社2015年版,第104页。

五、结 语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深刻指出：“一部中国史，就是一部各民族交融汇聚成多元一体中华民族的历史，就是各民族共同缔造、发展、巩固统一的伟大祖国的历史。各民族之所以团结融合，多元之所以聚为一体，源自各民族文化上的兼收并蓄、经济上的相互依存、情感上的相互亲近，源自中华民族追求团结统一的内生动力。”^①西藏及涉藏州县在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中积淀的爱国主义历史文化资源是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从融入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维度挖掘、诠释与传承，必将进一步促进边疆各民族的团结，增进各民族之间的了解和友谊，强化“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从这个意义上讲，爱国主义历史文化资源融入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不仅能进一步增强中华各族群众对伟大祖国的认同，更有助于从历史维度加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使中华文化宝库进一步得到丰富，为我国边疆地区一体与多元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提供新范例与思路。同时，边疆研究的不断发展也将进一步丰富历史文化资源，有利于深化西藏及涉藏州县群众对中华民族共同体和中国共产党的认同。^② 总之，按照全链条、全方位和全覆盖的“充分彰显中华民族的统一性、共同性与不可分割性，更好引领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前进方向”^③的原则，必须有理有据、规范有序地将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历史文化发展凝聚而成的独具特色的爱国主义历史文化资源融入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萃取有益资源，久久为功、潜移默化，从而切实有效增强“五个认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促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工作协同推进。

〔责任编辑 马俊毅〕

① 习近平：《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的讲话（2019年9月27日）》，《人民日报》2019年9月28日。

② 杜永彬：《论中国藏学研究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作用》，《中国藏学》2023年第1期。

③ 本书编写组：《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高等教育出版社、民族出版社2023年版，第4页。

Keywords: composite modernity; construction of the community for the Chinese nation; nation-building; state-building.

Approaches and Mechanisms of Integrating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Resources of Frontier Patriotism into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Community for the Chinese Nation: Taking Xizang Autonomous Region and other Tibetan Areas of China as a Case Penba lhamu (31)

Abstract: The historical crystallization of the community for the Chinese nation could not be separated from the extensive and in-depth communication, exchanges, and integration among ethnic groups in the frontier ethnic minority areas. In this process of integration, these areas have formed unique patriotic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resources, which urgently need to be excavated, interpreted, inherited and innovated based o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community for the Chinese nation. And for this reason, it is necessary to answer the three basic questions: what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resources are to be excavated, why these resources are to be integrated, and how to integrate them into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community for the Chinese nation. Taking Xizang Autonomous Region and other Tibetan areas of China as an example, the paper discovers that the people of all ethnic groups in this region have jointly created rich patriotic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resources, which are manifested in specific figures, events and other cultural relics, and already possess the legal attributes of patriotism determined by the *Patriotism Education Law*. It is necessary to star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two combinations” to explore the important characteristics of the resources. Patriotic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resources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community for the Chinese nation by consolidating the historical foundation, deepening cultural identity, enriching value significance, fostering the mainline thinking, and enhancing the effectiveness of party building, etc. The integration mechanisms should be constructed and optimized in terms of educational inheritance, publicity guidance, and rule of law-based guarantees.

Keywords: Xizang Autonomous Region and other Tibetan areas of China; construction of the community for the Chinese nation; patriotic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resources; logic of integration.

Mechanism and Practice Path of Promo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Community for the Chinese Nation through the Equalization of Basic Public Services Zhang Lijun and Liu Jin (48)

Abstract: Promo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community for the Chinese nation is an inevitable requirement for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ethnic work in the new era, during which the equalization of basic public services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mechanism of promo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community for the Chinese nation through the equalization of basic public services. Firstly, the equalization of basic public services is conducive to promoting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fair distribution, facilitating the achievement of common prosperity. Secondly, it helps to promote cultural identity and value identity, advancing the construction of a shared spiritual home for the Chinese nation. Thirdly, it aids in promoting emotional and identity recognition, enhancing the psychological sense of belonging of all ethnic groups. Fourthly, it helps to promote collaborative